

高罗佩《断案集》 译后记(上)

□张凌

此书中的八篇小说，并非创作于同一时期。1958年前后，高罗佩先生担任中东公使时，在黎巴嫩贝鲁特写出了《莲池案》《太子棺》《除夕案》，并在1958年将《除夕案》自费印刷了两百本，作为新年礼物赠送友人，名为New Year's Eve in Lan-Fang:A Judge Dee Story，英文本由贝鲁特的天主教印刷社(Imprimerie Catholique)出版，荷文本由荷兰范胡维出版社出版。

1961年，荷兰范胡维出版社(W.van Hoeve Ltd.)出版了荷文本，名为《狄公六案》(Zes Zaken voor Rechter Tie)，收入六个短篇，除了以上三篇之外，还包括《公文案》《两乞丐》《夺命剑》，并有前言后记。其中《莲池案》的插图有所不同。

1967年，此书的英文本由英国海涅曼出版社(William Heinemann Ltd.)出版，名为《断案集》(Judge Dee at Work)，收入了全部八个短篇，并附有作品年表。

1969年，范胡维出版社推出了另一种荷文本合集，以《五祥云》(Vijf Geluk-bringende Wolken)作为书名，收入《五祥云》《雨中客》《晨之猿》。此后出版的荷文本，一直沿用《狄公六案》与《五祥云》这两种结集体例。

《公文案》的英文篇名为The Red Tape Murder，其中的red tape，既可指缠在箭杆上的红丝，也可引申为官样文章与文牍主义，在此应有双关之意。高罗佩先生在写作时一向注重首尾呼应，此案起于遗失的公文，结尾处再度强调公文，可谓合情合理，而红丝只是在查案过程中出现的另一条辅助线索，故此译者选用“公文”而非“红丝”作为篇名。后来经友人提醒查对荷文本，发现并无“红丝”这一因素，而且篇名Moord en Ambtelijke Haarkloverij中的Ambtelijke Haarkloverij，意为繁縝公文，由此证明先前的推断无误。

《莲池案》中的施明，猜测是来自《漆屏案》后记中提到的施明，出自《棠阴比事》之《陈具饮馔》。关于此篇借鉴的《蒋常覩姬》，高罗佩先生在译著《棠阴比事》英文本中的《蒋常覩姬》一则后作有注解，分析了此案的不合情理之处，并显然在借鉴时有所避免。试译该注解的全文如下：

蒋常在客店众人里没能发现疑犯，于是设法在全体村民中寻找凶手。为了诱使凶手自我暴露，在开堂之后，蒋常留下了一名原在店内的老姬，天黑之后才让她离去，心想由于她年事已高，且又在夜晚时分，更加容易隐蔽，凶手便会上前打听有关查案的消息。不过有一点并不清楚，即那名男子第三次与老姬搭话时，蒋常为何不命人拘捕他。另外，蒋常为何要召集全体村民，也是令人不解。惟一的解释似是为了证据确凿，以免被皇帝批评为故意构陷无辜之人。还需指出一点，《折狱龟鉴》的编者略去了村民共有三百人这一节，并让蒋常在凶手第三次接近老姬时就捉住了他。

关于《夺命剑》中提及的女伶生活，或可参见高罗佩先生的著作《中国古代房内考》第九章中关于元代艺妓的一段记述：“这些戏中的女角多半是由妓女充任。所以从那时起，演戏也就成了艺妓和妓女日常训练的一部分。元代有一位只知其姓黄的学者写了一篇《青楼记》。该文描述了不下七十个艺妓的经历。她们当中有许多就是因为擅长唱歌和演戏而出名的。从《青楼记》的这些小传中可以看出，这些女子的一生是多么坎坷不平，它们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动荡不安。有些歌女被富人买去做妾，然后又把她们推给另一个人的私人戏班，最后或者嫁给戏班班主，或者辗转重操旧业。另一些女子则成了道姑，在帝国各大城市间流浪漂泊，一会儿当演员，一会儿当妓女，聊以为生，最后穷困潦倒，或被汉族官员，或被蒙古族官员收为姬妾。书中也谈到男演员，他们职业低贱，收入菲薄，妻子和女儿常常不得不依靠卖淫来补贴家用。”

309

大河剧《八重之樱》的开头相当精彩，也有历史感：主角山本八重，是会津藩炮术师（“炮”其实是枪）之女，在戊辰战争中率领本藩女兵对抗官军（打着天皇名义的长洲、萨摩联军），有“幕末的贞德”之称。而在场战争中大量使用的新式武器，却是因美国南北战争结束而转卖到日本的剩余军械——所以幕末的时代剧，却是以美国内战作为序幕。

这顿然让我想到了中国。

南北战争结束于1865年。在中国，正是在一年前，天京(南京)陷落，太平天国之乱平定，是为“同治中兴”；在日本则相反，正是在

一年后，长洲、萨摩两大强藩结盟对抗幕府，走向了倒幕运动的高潮。而倒幕运动成功的关键之一，是他们通过英国军火商获得了来自美国的七千多枝新式枪支，其性能比幕府军(会津藩是主力)的旧式枪支要优胜得多。可以想象，若当时太平天国仍未平定，这些枪支更可能会流入中国的。

表面看起来，清朝平定太平天国是幸事，可也因此，美国的旧枪支流入了正在走向战争的日本，而非结束了战争的中国。这样，清兵就错过了一次熟悉新式枪械乃至新式军制的机会。而在近三十年后的甲午战争中，正是更熟悉新式枪械的日军打败了清军。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三九



新书快递

断案集
[荷兰]高罗佩著 张凌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本书包括八个短篇。《五祥云》讲述公元663年，狄公任蓬莱县令时，独自勘破贺夫人自尽一案；《公文案》讲述公元663年，狄公任蓬莱县令时，由马荣乔泰协助，勘破苏被总被害一案；《雨中客》讲述公元663年，狄公任蓬莱县令时，独自勘破当铺掌柜被杀一案；《莲池案》讲述公元667年，狄公任汉源县令时，由马荣协助，破获老诗人孟崖被杀一案；《两乞丐》讲述公元669年1月15日，狄公任蒲阳县令时，与洪亮勘破教书先生被杀一案；《夺命剑》讲述公元669年，狄公任蒲阳县令时，与马荣乔泰勘破卖艺少年被害一案；《太子棺》讲述公元672年，狄公任兰坊县令时，在大石口县，独自勘破两桩疑案；《除夕案》讲述公元674年，狄公任兰坊县令时，独自破获了一桩离奇案件。

万火归一
[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著 陶玉平译
南海出版公司

在有限逼仄的空间内，将自身的意识和想象发挥到极限。午夜的公路上、飞机的机舱内、冰冷的病房中、玻璃穹顶的天空之下……科塔萨尔的笔下诞生出一个个奇特扭曲、坚韧隐忍的灵魂，他们挣扎着逃脱既定的命运，即便火焰已不可抵挡地团团包

围。本书是胡里奥·科塔萨尔短篇小说的集成之作，小说构思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展开，一如作家往常的风格，随着情节发展逐渐剥离开失控和荒诞的一面，将现代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思议的复杂情绪以超然的手法表现得淋漓尽致。

优雅的守卫者:人类免疫系统的故事
[美]马特·里克特著 秦琪凯译
中信出版社

免疫系统是人体必不可少的防御系统，它守护着我们，对抗疾病，治愈伤口，维持秩序和平衡。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它已经过不断磨练，以面对几乎无限的威胁。然而，尽管免疫系统是如此复杂精妙，但它依旧容易因疲劳、压力、营养不良甚至过度卫生等因素而受到损害。作为一位杰出的记者、作家，作者以扎实的材料和动人的笔触，为我们讲述了属于科学的侦探故事。从黑死病到20世纪的疫苗和抗生素突破，再到革新性免疫学研究的实验室，这也许是这个时代最特殊、最重要的医学故事。

亚洲与一战
徐国琦著 尤卫群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部亚洲视角下的新一战史，全景展现中、日、朝、越、印五国共有的近代化历程。一战是亚洲五国共有的近代化起点；一战并非只是欧战，亚洲的参与也不可忽视……

反读书记(一零九)

□胡文辉

照我们一般的印象，大约都觉得甲午之败，是败于海战；但仔细想来，甲午之败，实败于陆战！要知道，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虽受重创，但主力尚存，后来是由于日军抄后路攻占威海卫炮台，海陆夹击，才造成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也就是说，真正决定甲午战争结局的，可以说是围攻威海卫炮台的陆战。(日军的这一战略，后来在日俄战争中以更大规模的方式重新演示了一次：日本陆军拼死攻下旅顺口的俄军堡垒，遂能全歼困守在旅顺港内的俄国舰队，由此一举决定了日俄战争的结局。)

如果中国大兵早些熟悉西洋新式武器，甲午时的陆战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呢？这就是历史因果的复杂之处和微妙之处了。

“对‘红楼梦’三个字不要看得太重”

□钱之俊

1954年10月，毛泽东的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让一场针对俞平伯的批判在全国展开。文学所内同样也展开了批判。主持业务的副所长何其芳反复强调这是学术批判，批判前为批判会定好了调。

当时讨论会确定了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红楼梦》中有无色空观念，如果有，在全书又占据怎样的地位？钱锺书在一次批判会上对此作了发言：

钱锺书感到俞平伯把“色空”二字看得太实了。钱锺书认为做和尚在当时不一定就是最坏的。鲁智深、武松做和尚，也好像可以做得；明代有许多民族英雄人物也做了和尚；对“红楼梦”三个字不要看得太重。莎士比亚在一些戏剧中也有过人生如梦的感慨，但不能说他具有佛家思想。我们应该说像贾家这样的人家，做了许多坏事，结果自然就是坏结局。(马靖云《文人相重》)

钱锺书的所谓“批判”实际极其平和，对他俞平伯还是比较尊敬的。俞平伯算得上是钱的老师。钱锺书1929年考进清华外文系时，俞平伯是中文系讲师，都属于文学院。解放后，俞平伯在北大中文系，钱锺书在清华外文系。1952年院系调整，他们都分到文学研究所，后同在古典文学组共事。1956年，文学所评定职称，文学所内确定了三个一级研究员，钱锺书是一个，另外两个就是俞平伯和何其芳。但何其芳自己改为了二级。

“文革”期间，钱锺书和俞平伯都受到批判，曾一起下放干校，一起劳动、搓麻绳。马靖云回忆，“文革”十年，老文学所三楼，二十几位专家，包括俞平伯、钱锺书，都被关在里面写交代材料。对“文革”期间钱锺书的表现，马靖云印象深刻。她说：“那个时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钱锺书，他头脑极其清楚，处事极为淡定。”(《文人相重》)

“文革”以后，大家都受到平反。1977年，他们又同住在三里河南沙沟一个小区，俞住11号楼，钱住6号楼，来往较多。1978年11月，余英时任团长的美国科学院汉代研究观察团四人来大陆访问，钱锺书、余冠英在俞平伯家接待了他们。1981年11月，钱锺书介绍俞平伯为马汉茂译的《浮生六记》作序。1981年12月，钱锺书介绍香港《广角镜》月刊采访俞平伯。1982年2月，钱锺书夫妇去俞家看望俞平伯，家人未通报，以致未见。俞平伯知道后极为生气，特让女儿赶到钱家致歉。

在担任副院长期间，1986年1月21日，文学所举办纪念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庆祝会，钱锺书参会。会前，所长刘再复征求钱锺书意见，他非常明确地说：“你做得对，我一定出席你的会。”开会时，钱锺书与俞平伯、胡绳等坐在主席台。会议成功举办，钱锺书会后对刘再复说：“会开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刘再复《钱锺书先生纪事》)

钱锺书很少参加这类会议，也很少对同时代学人有这么客气甚至推崇的态度，俞平伯是少数几位之一。俞先生长钱锺书10岁，家学渊源(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为人正直善良，性格豁达，新旧文学皆有成就，又是清华师辈，钱锺书的尊重不是无来由的。